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研究

研究生姓名: 吕林海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许晓永 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金融硕士

研究方向: 金融投资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3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科研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吕林海 签字日期：2024年6月3日

导师签名：许晓红 签字日期：2024年6月3日

导师(校外)签名：_____ 签字日期：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吕林海 签字日期：2024年6月3日

导师签名：许晓红 签字日期：2024年6月3日

导师(校外)签名：_____ 签字日期：_____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Candidate : Lyu Linhai

Supervisor: Xu Xiaoyong

摘要

2021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适时运用降准等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建设好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助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作为现阶段国家经济建设领域工作的主要任务,同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完善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因此金融行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加强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契合度,在社会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做好金融资源的引导工作。一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属于间接金融市场。我国在直接金融市场存在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匮乏、市场规模较低、缺少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问题,均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造成影响。

本文以陕西省为案例,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进行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分别对陕西省金融业发展状况,实体经济发展状况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状况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期了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其次,通过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陕西省与各地级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再次,通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基于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研究结论,提出提升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建议:完善地方法人、金融中介、融资担保机构的协同服务体系;培育具有陕西特色的衍生品交易市场,打造发展新格局;推进覆盖产业集群、全产业链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

关键词: 实体经济 金融机构 金融服务体系

Abstract

In July 2021, the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proposed the timely use of RRR reduction and other tools to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real economy.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and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mphasize that we must build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ake help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s the main task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t this stage, while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serve the re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medium - and long-term fund supply system of the re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financial industry should adhere to the purpo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improve the matching of financial supply and the real economy, and guid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better support the key areas and weak link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has relied on the indirect financial market dominated by banks, and the direct financial market has been relatively low in scale, imperfect market mechanism, 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and lack of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 which have directly affecte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This paper takes Shaanxi Province as a case and focuses o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interpret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haanxi's financial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real econom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real economy. Secondly, the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irdly, by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Shaanxi Province's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haanxi Province's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service system of local legal person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financing guarantee institutions; Cultivate

a derivative trading market with Shaanxi characteristics to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e wi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service centers cover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Keywords : The real econom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目 录

1 引 言	1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	2
1.2 研究意义.....	2
1.2.1 理论意义.....	2
1.2.2 现实意义.....	2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1.3.1 国外研究现状.....	3
1.3.2 国内研究现状.....	4
1.3.3 文献评述.....	6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6
1.4.1 研究内容.....	6
1.4.2 研究方法.....	7
1.4.3 研究技术路线.....	8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9
1.5.1 研究的创新点.....	9
1.5.2 不足之处.....	9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10
2.1 概念界定.....	10
2.1.1 实体经济.....	10
2.1.2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10
2.2 理论基础.....	11
2.2.1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11
2.2.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12
2.2.3 金融功能理论.....	13

3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14
3.1 金融业发展现状.....	14
3.1.1 信贷总量和金融业内部发展情况.....	14
3.1.2 社会融资结构.....	15
3.1.3 金融支持措施.....	16
3.2 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17
3.2.1 实体经济产值.....	17
3.2.2 实体经济质量.....	18
3.2.3 产业结构.....	20
3.3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22
3.3.1 保险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情况.....	22
3.3.2 社会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情况.....	23
3.3.3 优化金融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情况.....	25
3.4 本章小结.....	26
4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测度	27
4.1 DEA-Malmquist 效率测度模型原理.....	27
4.2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28
4.3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指数分析.....	29
4.3.1 陕西省总体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指数分析.....	29
4.3.2 省会和地级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指数分析.....	30
4.4 本章小结.....	31
5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实证分析	32
5.1 变量选择.....	32
5.1.1 被解释变量.....	32
5.1.2 核心解释变量.....	32
5.1.3 控制变量.....	33
5.2 模型设定.....	34
5.3 数据来源.....	34

5.4 回归结果.....	34
5.5 稳健性检验.....	36
5.6 实证结论分析.....	37
5.6.1 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关系不显著.....	37
5.6.2 企业中长期信贷可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38
5.6.3 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呈负向关系.....	38
5.7 本章小结.....	38
6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研究结论和启示建议.....	40
6.1 研究结论.....	40
6.2 建议.....	40
6.2.1 健全地方法人金融中介和融资担保机构相辅相成的服务体系.....	40
6.2.2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培育具有陕西特色衍生品交易市场.....	42
6.2.3 推进覆盖产业集群全产业链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	43
参考文献.....	46
后 记.....	51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1.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应继续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确保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作为党的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等建设，发挥基础设施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陕西省委书记、省长刘国中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提升经济质量、做大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是推动现阶段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即以坚持创新驱动为主攻方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共同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当前陕西省在实体经济领域发展成果亮眼：农林渔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 17.1%，装备制造业增长 12.8%，服务业同比增长 7.3%，但在以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值扩张较快，导致产能过剩、劳动力红利衰退、传统产业发展陷入瓶颈、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等问题。

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反复强调，要完善实体经济资金供给制度，建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体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打造具有竞争力与高适应性的普惠金融体系。陕西省在《陕西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出：通过提升国有金融资本运营水平，加快“风投”、“创投”、“产投”等金融产品，完善政府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推进自贸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措施，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因此，金融应为实体经济服务，保障实体经济稳健运行。避免金融资源过度流入虚拟经济，确保金融资源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则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为适应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需要，以及改变当前陕西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释放金融价值，加速陕西省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1.1.2 研究目的

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产业资本通过投入、产出再到最终消费这三个环节的循环，实现价值增值。与此同时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体系中的角色是借贷资金供给者，它将资金投入实体产业，通过利润分配实现增值和循环。因此，金融资本价值增值来源于产业资本的增值。金融资本价值增值必须与实体经济产值的增长相关联，因此金融业作为中介服务机构，须立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当前，陕西省金融业总体发展向好，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改善显著。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频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有待提升。具体表现在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区域性金融服务体系亟待完善，金融信贷业务创新与实体经济的业务扩张需求不契合，融资结构单一。本文通过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现状，分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旨在提升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目前，金融业在融资增信，信息共享与风险分担方面对小微企业支持不足，缺少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布局。金融业存在“超发展”问题，实体经济发展相对金融业明显落后，我国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低下。同时，社会资本因为金融业的高杠杆率而大量涌入金融市场，导致社会资本分配不均衡。本文以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均衡发展问题作为切入点，研究陕西省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提升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

1.2.2 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提升陕西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促进金融业服务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有文献的金融效率测度没能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并且普遍使用存贷款余额，缺乏适切的衡量。鉴于此，研究

如何提升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促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3 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实体经济研究现状。实体经济这一概念源于西方,Chatterjee K U (2024) 将实体经济理解为商品与服务的循环,并将其与现实经济相对立的符号经济视为资金流动、汇率和信贷流动。把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实体经济和符号经济。Ionescu V R (2023) 指出,实体经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以商品和服务为主的实体经济与以货币、信用为代表的符号经济二者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金融对经济影响的研究现状。金融对经济的影响作用经国外学者 Joeri L (2024) 研究认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具备积极的支撑作用。Few C L (2023) 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展开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会增加储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研究现状。在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研究中,国外的学者大多将注意力放在效率的度量上,其中 Jean-Pierre A(2023)使用 DEA 测算商业银行效率。Ria K (2023) 构建面板随机前沿模型 (Plate Random French Model) 研究了宏观经济增长中金融中介的作用。Shahzad H (2023) 通过物力、人力、政府、财力指标测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Nazia L (2023) 从微观角度出发,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对经济带区域的金融服务效率测算,并实证检验。Melissa F V (2023) 同样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与趋势进行测度,并且通过动态数据对各要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发展性的政策建议。目前,除了从各地区的角度来探讨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将研究的角度聚焦于特定区域。M. A L (2023) 运用 BCC 模型、Dea-Malmquist 指数等,证实总体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程度较高,且呈上升的趋势。

从国外诸多优秀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与金融经济相关的理论研究十分丰

富，很多发达国家的学者对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的研究既深刻又广泛，具有现实价值和实践方法，为后续研究创造了坚实的理论 and 现实基础。

1.3.2 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国内起步较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金融改革进程的加深，众多学者相继开展探究。伴随着全球宏观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事件的周期性发生，部分学者对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再度思考。有学者认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是荣辱与共，互利共生的关系，金融体系通过对可贷资金的运作，创造直接经济价值。同时，金融体系的高效运作有利于实体经济投融资效率的提升，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张晓朴、朱太辉，2014）。

针对现阶段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普遍认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不存在完全正向协同影响关系。如完颜素娟（2022）通过分析金融业发展状况、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以及银行业贷款总量及其结构，得出“我国金融业发展过快，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他认为金融过度化发展抑制了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张亦春、王国强（2015）；贾高清（2020）；过旭东（2021）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均衡性关系，当金融过度膨胀，偏离实体经济运行轨道时，则会对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负作用。当两者相契合，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即金融的发展速度应以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为“锚”。

部分学者基于金融体系视角，将金融体系划分为不同维度，并据此分析金融体系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例如周悦、董竹（2020）分别研究了金融行业结构与宏观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证实金融市场结构和证券业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呈正向关系，但金融开放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负向作用。董竹、周悦（2019）分析了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对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性，而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吴少将（2020）、王永钦、高鑫等（2016）等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开放虽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忽视客观现实，不考虑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程度，进行过度市场开放会阻碍金融对实体经济

的发展作用。

基于区域金融与区域实体经济发展视角,不同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基于区域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得出了差异化的结论。张林、冉光和、陈丘(2014)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实力对于本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有促进作用。汪发元、郑军(2019)通过研究长江经济带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发现本区域内的金融发展对于实体经济起到积极正向作用,但对毗邻区域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就陕西省而言,张宏亮、袁伟雄(2014)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具有长期协同关系。

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现状,主要从效率测度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

目前有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测度研究相对较少。游士兵、杨芳(2019)基于绿色发展视角,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证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不足,主要靠规模效率拉动。孙红燕、管莉莉、张先锋(2021)以投入产出分析法,分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程度,发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量呈现上升趋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满足其市场性生产的需要来实现。Suo 和 Wang (2009); Han 和 Qu (2016)等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就金融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效率展开研究,对金融支持我国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前者发现,在世纪之交,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效率水平较低。后者从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角度,证实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支持有效性总体表现良好,但近年来的金融支持效率有弱化的倾向。

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实证的研究。张军(2005)和李青原等(2013)分别通过构建 DEA 模型,得出“金融行业规模的快速增加与制度体系优化以及对地域的重要性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正向的影响”的结论。李延凯和韩廷春(2011)基于金融生态演进的视角,证实金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受外部金融生态的影响。此外,少部分学者以中国各省份及自治区为研究样本,直接分析探讨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子。如,蔡则祥和武学强(2017);张林和张维康(2017)等分别运用 Eluen-berger 指数法、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和 Dea-Malmquist 指数法对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同时针对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体系结构、直接融资比重、金融业垄断等因素根据区域的不同,其影响程度与机理也存在差异。

1.3.3 文献评述

综上,学术界很早就开展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研究程度广泛且深入,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实体经济增长关联性方面,以理论基础研究为主,探讨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并开展了实证研究。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还存有不足之处:首先,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是资金,价格和产品,资金流向导致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严重拉低我国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但是,就“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实证性研究有待增加;其次,现有的实证研究很少结合陕西省地级市数据进行分析,并且未能给出详细建议。再次,由于研究区域与目的差异不同,现有的测度指标不统一,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测度结果差异性较大。本文对于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测度,基于陕西省实际情况和面板数据,并且参照其余各省测度指标进行,并依据陕西省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结合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对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加以分析。最后根据陕西省各地级市的实际情况给出改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建议。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内容

第一章,引言。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目的,通过研究背景阐述地方政府对于金融和实体经济提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发现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足等问题。研究意义分为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研究,梳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脉络,分析测度金融效率指标,依据相关实证研究,查找研究中的不足,并加以补充说明。此外,本文还运用理论分析法研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运用了实证分析法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的内容,研究过

程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进行说明。

第二章，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针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和实体经济的概念予以界定，在理论基础部分解释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结合陕西实际情况，从信贷总量和金融业内部发展、融资结构、金融支持措施方面，分析陕西省金融发展现状。从实体经济产值、质量、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分析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现状。从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情况、社会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情况和金融环境优化服务实体经济情况三个方面，分析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现状。

第四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测度。指标选取结合了国内外近些年研究数据和陕西省本地实际情况，运用 DEA-Malmquist 模型测算效率，包含一个产出指标，三个投入指标。

第五章，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证分析。根据陕西省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结合理论基础和相关文献，构建包含金融支持要素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综合效率指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构成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金融支持要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实证结果展开分析和解释。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首先，根据全文的研究内容，得出研究结论。并依据结论，提出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建议。

1.4.2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阅读国内外大量参考文献，依照文献的研究理论与结果进行分类整理，通过归纳与分析，总结出研究的现状与研究不足之处。通过互联网和各大相关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与参考文献，挖掘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之处。进而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完成界定核心概念、选择实证方法等准备工作。

实证研究法。通过互联网与数据库获得的数据内容或计算所得的数据，使用参数估计法，对实验数据与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分析，验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客观事实。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验证。

定量分析法。该方法主要对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数据化、

图表化处理，以更清晰的数据、更直观的图表得出结论。

1.4.3 研究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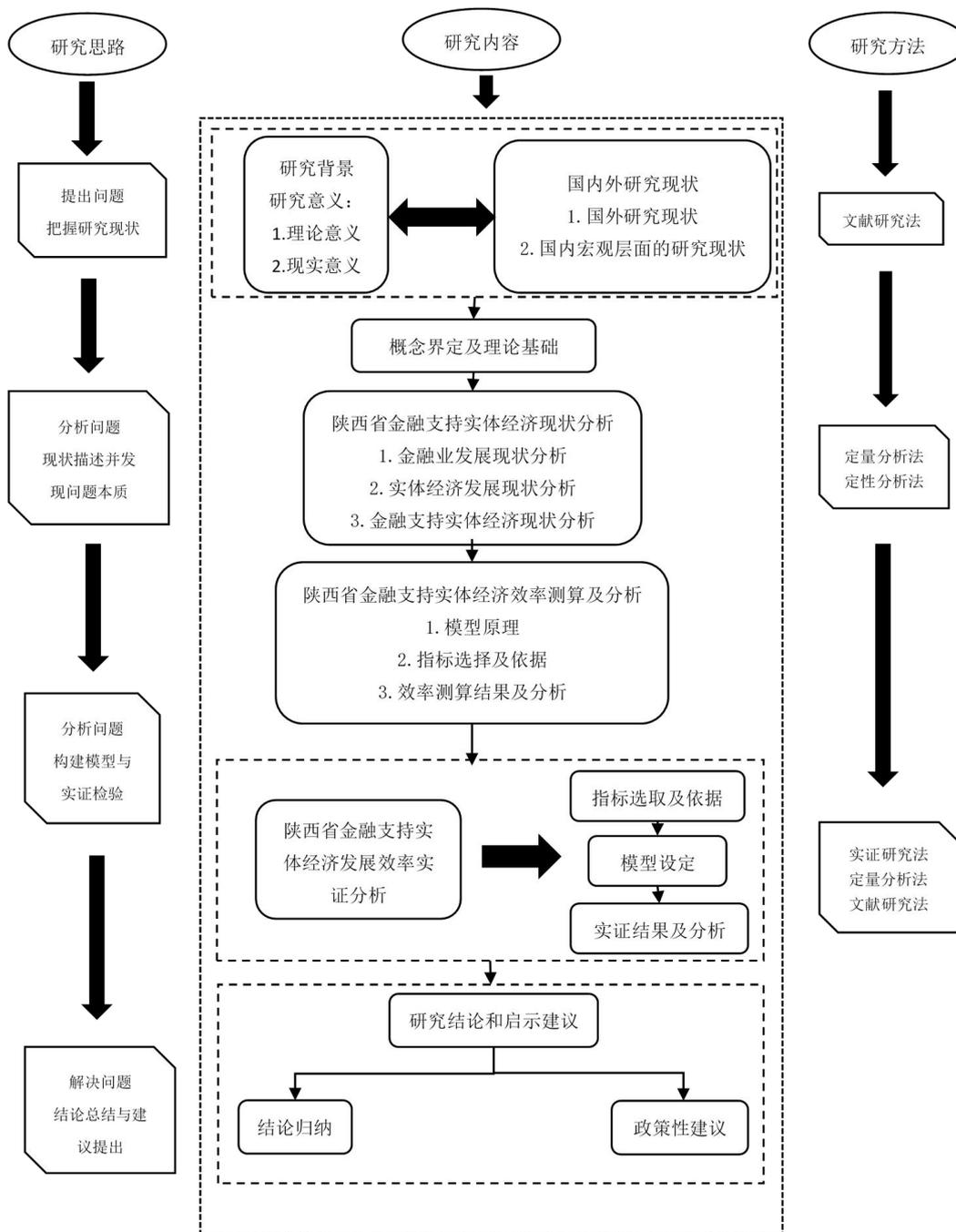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5.1 研究的创新点

第一，选取测算指标时，本文将金融资金投入，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与固定资产投资纳入投入要素，产出要素为实体经济产出，规避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测算阶段仅考虑资金投入要素，不考虑金融部门作用而带来的测算影响。

第二，在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研究起步晚于国外，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方面，但当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区域差异明显，所以就如何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而言，还需考虑区域性差异。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影响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展开研究，本文对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丰富了省级层面研究成果，且以地级市为单位，具备经济学意义。

1.5.2 不足之处

第一，本文在对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测算时，由于地级市所公布的金融数据有限，部分地级市存在数据缺失现象，因此尽管本文尽力筛选出金融投入类要素指标，但也难以控制遗漏重要数据指标的概率。

第二，本文在对于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时，由于县乡镇一级的数据难以获得，样本空间可能不足，进而导致无法对各金融支持要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更准确的分析。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又称物质经济或物质生产经济，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直接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包括农业、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这些生产活动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目的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生活必需品。实体经济的核心特征是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实物性和经济性。生产活动的物质性指的是生产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原材料、动力，这些资源和要素的组合可创造出具有实际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实物性是指生产活动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具备实际物理形态，可在现实世界中被消费和使用。经济性是指生产活动以实现经济利益为目的，实现增加收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体经济在现代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生产活动满足社会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再次，实体经济对国家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来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然而在全球化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等因素的影响下，实体经济面临着挑战，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和企业须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手段。总之，实体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努力，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2.1.2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即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效率，主要是指金融系统如何有效地将资金分配给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高低取决于金融系统的资金配置能力、服务质量、创新能力等方

面。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实体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若金融系统能够有效地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企业和个人可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反之，如果金融系统无法有效地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可能受到限制，甚至出现经济衰退。其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高低也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如果金融系统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导致企业和个人投资不足，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总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以及国家经济安全。通过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创新，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有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2.2 理论基础

2.2.1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在最优金融机构理论提出之前，多数文献均围绕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和制度，研究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然而，通过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无法解决何种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一普遍性问题。因此，林毅夫等人根据之前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问题，提出一种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该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研究不同类型的金融体制与不同层次的实体经济产业发展形态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机制，从而逐渐确立一种金融制度，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特点相互协调。

理论研究思路为：首先，不同特点的金融体系和制度安排分别对应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效果，因此要明确各类金融制度安排所具备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两方面，其一是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其二是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其次，由于各类融资者自身的不同经营发展特征决定了其适合的金融服务需求层次，因此要关注融资者的特性，该问题的讨论从两个方面展开，即企业规模与企

业的风险特征。再次，论述经济体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之对应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融资者特性。阐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所对应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最优金融体系和制度安排。最后，基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视角，推导出最优金融体系结构的发展变化规律。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为更好发挥金融系统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应构建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水平相吻合的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金融中介占据主体，相比于发达国家是最优金融结构，而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则作为辅助协同发展。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视角，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技术水平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由此决定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向大型商业银行占据主体、发达繁荣的金融市场转变。

2.2.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工业经济发展催生了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更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更为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同时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过程促进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如今知识经济的到来使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鉴于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白钦先等学者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该理论研究的是通过正确认识货币的非中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的现实表现，确立在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该理论研究思路是：首先，明确金融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确立金融非中性的目的在于将金融体系和金融过程与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发展过程有机联系，从而使得对于金融问题的研究摆脱了局部经济学研究的束缚。其次，现在提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可将可持续发展观念引入金融学的研究领域。最后，基于金融资源理论，施加新的可持续发展约束条件，产生全新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观。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结论和观点：首先，批判了金融自由化的观点，该观点的缺陷在于不能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点看待金融过程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盲目推进金融自由化终究难以解决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因此，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金融简单的量性增长无法提升金

融资源配置效率，更难以推动经济的发展。该理论强调，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质的飞跃，即能否合理的开发、利用、配置金融资源，确保金融中间机制的畅通，以提升金融效率。

2.2.3 金融功能理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金融结构体系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当前的金融系统集中表现为：金融市场规模扩大，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中介有被市场替代的可能性。此前的理论研究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观点，将金融体系各构成要素割裂开来，探究金融体系各组成成分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程度的差异。该研究方法显然无法从更全面的角度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找金融解决思路。因此，Bodie & Merton(1993);Merton & Bodie(1993,1995);Merton(1995)提出了金融功能理论。

该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将各种不同金融体系和制度安排均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金融服务模式，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组成部分在支持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不同的作用。研究的思路体现在：首先，由于不同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因此着重探索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存在内在联系，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其次，具体研究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分别在金融系统运行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最后，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解释金融创新螺旋的本质。

该理论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介与市场有内在逻辑联系，他们分别履行金融产品的创造和推广功能，并非是非此消彼长的替代性关系。第二，金融中介会进行金融产品的创造，而成功的金融产品会被推向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是金融产品孵化器，金融产品须通过这一机器完成从产生到应用推广的蜕变。该理论提出者将金融产品从产生到应用的这一动态过程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朝着有效率的方向前进。随着金融创新螺旋过程的加速向前，金融产品的交易量增加，新金融产品出现，市场逐步完善。产品增多导致投资者与金融中介参与套利，从而导致交易成本降低，以促进新金融产品创造。

3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3.1 金融业发展现状

3.1.1 信贷总量和金融业内部发展情况

2016-2022年陕西省金融业产值平稳增长,金融产业产值从2016年的1295.06亿元增加至2022年的2109.71亿元,增长了62.91%,平均每年增长8.48%。从占比看,2016-2022年期间:陕西金融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在6%~7%之间波动,波动幅度不超过1%;陕西省金融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在14%~15%之间波动,最低为2019年,占比13.92%,最高为2016年,占比为15.34%,波动幅度不超过1.5%,如图3.1所示。



图 3.1 2016-2022 年陕西省金融业产值变化示意图

贷款总额是衡量一个地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2016至2022年期间,陕西省内贷款总额逐年增加,详情见图3.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22年底,陕西全省各金融机构本年度共投放本外币贷款约48860.45亿元。本省自2016年以来,全省各金融机构所发放贷款呈稳步增长态势,人民币贷款数额从2016年底的23921.75亿元增长至2022年末的48860.45亿元,陕西省人民币贷款规模实现翻一番。从年增长速度看,平均每年同比增长13%,前些年增长较快,近两年贷款规模增速趋于平稳。从金融业内部

情况看，2022年，银行业资产、负债、净利润同比皆有增长，非金融行业逆转了负增长的态势。保险业资产有所增加，法人证券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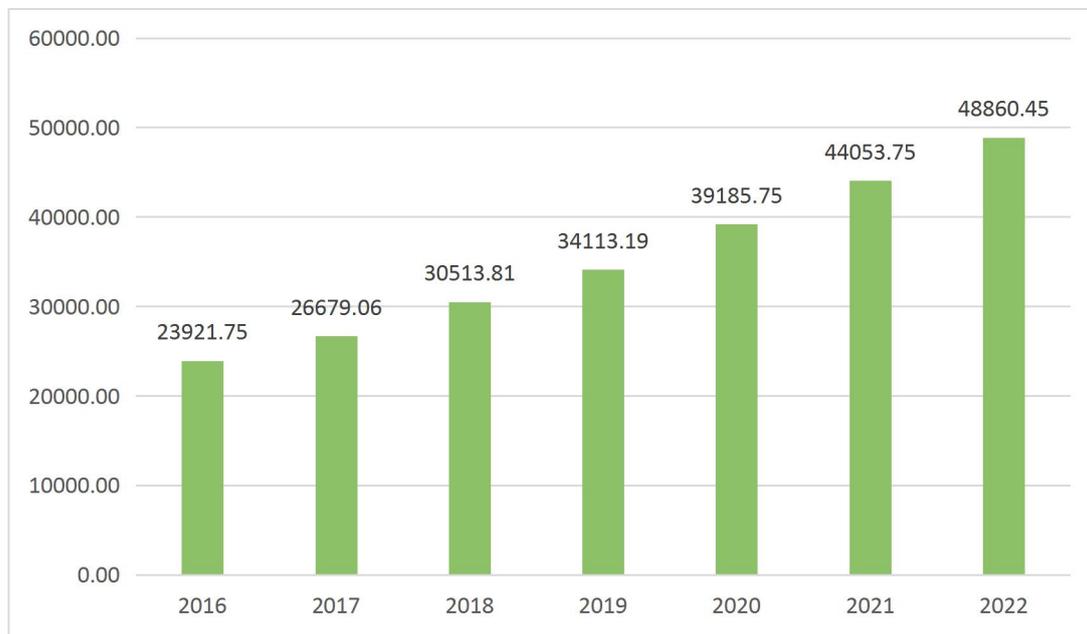


图 3.2 陕西省境内人民币贷款（亿元）情况变化图

3.1.2 社会融资结构

基于陕西省金融机构所发放贷款的结构情况，按贷款类别分为：境内贷款和境外贷款。截止 2022 年底，本省金融机构发放境内贷款 48624.93 亿元，境外贷款 6.66 亿元。境内贷款包含住户贷款、企（事）业单位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金额为 33913.51 亿元，占据金融机构境内所有人民币贷款的 70%，住户贷款 14711.24，占据金融机构境内所有人民币贷款的 30%。在 2022 年底，债券投资额 5790.25 亿元，较上年增加 1885.61 亿元。受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增加影响，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同比增加，中长期贷款也出现大幅增加，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制造业、建筑业、科技和卫生领域的信贷资金投放力度持续加大。从制造业贷款情况看，截止到 2022 年，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 3334 亿元，较 2020 年增加 487.78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1149.2 亿元，平均每年同比增速为 10.52%。从贷款结构上看，其中信用贷款余额 1363 亿元，占比为 40.1%，较 2019 年末提高 16.4

个百分点。由此看出，自 2020 年起，制造业贷款增长速度加快，制造业信贷投放规模稳步回升。建筑业贷款所披露的信息显示，2021 年全省建筑业贷款余额 1845.80 亿元，同比增长 37.57%，较上年末大幅提升 19.2 个百分点；全年建筑业贷款新增 499.36 亿元，是上年新增额的 2.43 倍。建筑业贷款的快速增长有力保障了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通过分析科技、卫生、社会事业类贷款信息得出：2021 年末，全省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余额 206.08 亿元，同比增长 18.7%，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5.47 个百分点。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贷款余额 170.29 亿元，同比增长 19.1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5.88 个百分点。

3.1.3 金融支持措施

为满足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需求，保障非金融类中小微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空间，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按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引，持续增加普惠小微贷款投放规模，普惠贷款覆盖面不断拓展。2021 年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5917.12 亿元，与 2017 年相比，共增加 1912.63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 10.25%，其中 2017 至 2020 年增速相对较快，在此期间每年平均增速约 13.77%，2020 年后增速放缓。2021 年末，全省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2915.43 亿元，较 2019 年共增加 1396.73 亿元，近三年平均每年以 38.4% 的同比增速增长；贷款户数 50.84 万户，较 2020 年同比增加 33.08%。2021 年末，全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余额 1539.3 亿元，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35.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2.17 个百分点。

为积极响应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陕西省启动农产品资金需求及时响应等机制建设，确保乡镇企业农产品生产资金需求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有效衔接。通过近几年的探索，本省涉农贷款和绿色转型贷款增加，稳步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建设和生态环保事业发展。首先，绿色贷款增速不断提升，成为政策性信贷工具的新增长点，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程度提升明显。2021 年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 3700.48 亿元，较 2018 年增加 1907.12 亿元，每年平均以 27.3% 的同比增速增长。其次，涉农贷款规模取得新突破，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幅度加大。2021 年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 8948.64 亿元，较 2017 年增加 2352.9 亿元，每年平均增长 7.93%。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 2126.61 亿元，同

比增长 16.74%，较上年末提升 1.98 个百分点。

3.2 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3.2.1 实体经济产值

基于上述对实体经济的界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核算中，实体经济产值不含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因此，陕西省的实体经济产值为：地区生产总值减去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产值之和，其产值及变化情况如图 3.3 所示。实体经济产值除 2020 年下降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增长态势，且增长均超过 6%，在 2021 年增长速度高达 16.93%。



图 3.3 2016-2019 年陕西省实体经济产值情况图

分析实体经济占比情况（图 3.4），除却 2020 年，陕西省实体经济产值占比基本保持在 88% 左右。2020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导致实体经济受创，实体经济产值占地区总值的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为 87.09%，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同向变动。2016 年至 2020 年，陕西实体经济占比从 88.65% 降至 87.09%，反应出该时期，陕西省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发展快速，实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020 年至 2022 年间，陕西省实体经济占比快速提升，从 87.09% 上升至 88.63%，该现象的出现源自后疫情时代，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外加房地产行业投资放缓，恢复经济成为当前发展的首要任务。国家通过“取消禁止摆地摊”政策，支持地摊经济和夜间经济的发展，又通过发放优惠券等手段促进消费，推

动实体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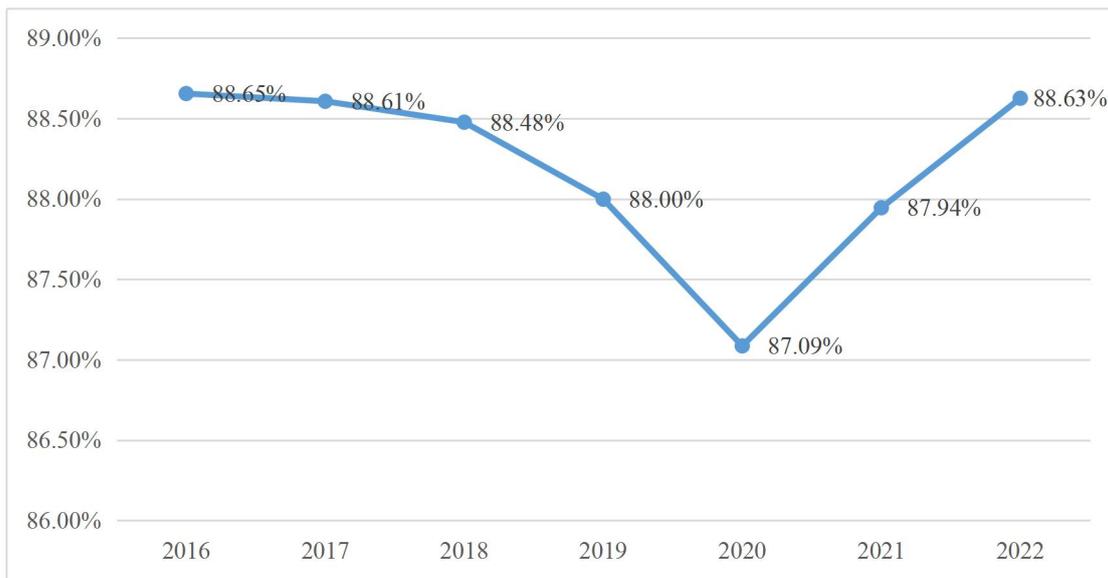


图 3.4 2016-2022 年陕西省实体经济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图

3.2.2 实体经济质量

基于实体经济结构（图 3.5）研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 2016 年的 10.05% 下降至 2022 年的 8.87%，第二产业比重从 2016 年的 52.75% 上升至 2022 年的 54.86%，第三产业（不含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比重从 2016 年的 37.21% 下降至 2022 年的 36.28%。分阶段看，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第一产业比重在波动不大，在 9% 作用上下波动；第二产业呈现先降后升态势，从 2016 年的 52.75% 降至 2020 年的 49.54%（跌破 50%），然后升至 54.86%；第三产业则是先升后降态势，从 2016 年的 37.69% 升至 2020 年的 40.45%，然后降至 2022 年的 36.28%。在 2020 年前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转换了方向，由“三升二降”转变为“二升三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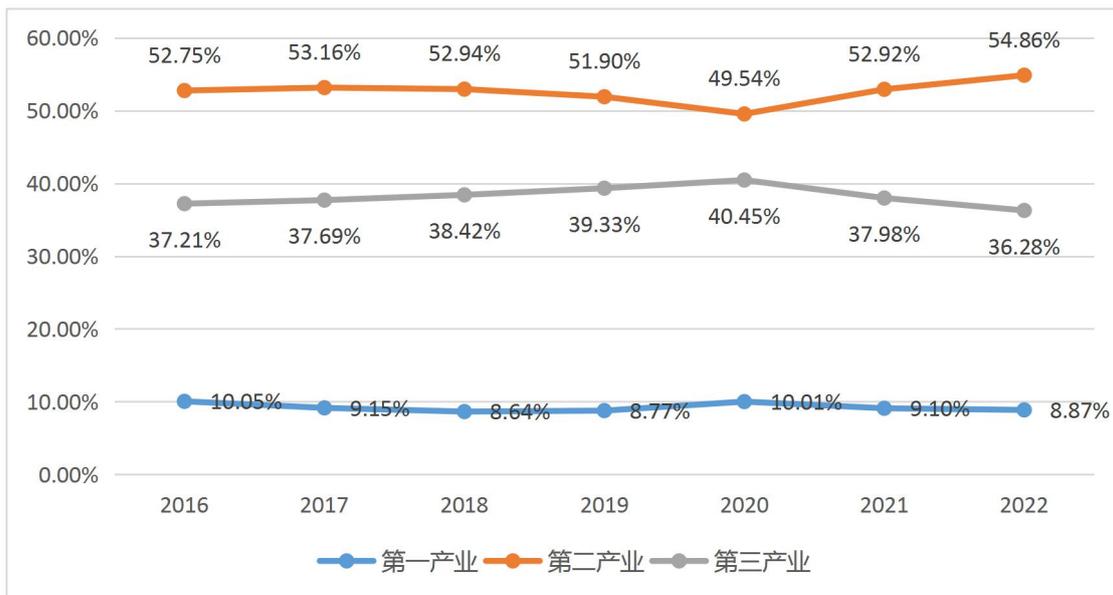


图 3.5 陕西省实体经济结构变化图

陕西省是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制造业大省。近些年工业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工业升级加速，工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在过去的几年里，陕西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投入数百亿元科创基金，综合科技创新水和半导体产业规模均位居全国第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平均增速超过 10%，战略新兴产业产值增速达到 9.8%，高新技术制造业产值增速达到 13.8%。光伏制造业产值近千亿元，半导体产业规模达 1700 亿元，汽车产量突破 130 万辆。第一产业是第二产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粮食安全关系到大局发展，为此陕西省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建成高标准农田 2011 万亩，粮食生产实现十连丰，农业产值突破千亿元。

经济发展不仅是速度和数量的提升，同时还要实现开放与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增点，治理好工业污染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固体废物利用量可反应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情况。2016-2022 年期间，陕西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从 2017 年的 3000 多万吨上升至 2022 年的 6000 多万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从各地的具体数据看，渭南和榆林两地的固废综合利用量比其他城市数量大，说明两地的经济质量呈现动态提升，但从侧面看，也证实渭南和榆林两地的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在绿色发展的理念引领下，绿色发展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综合来看，在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固废的综合利用量提升。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也是陕西省的支柱产业，在以往发展中，陕西省对火力发电、煤化工、石油化工等依赖较重，这些产业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

生态环境承载压激增，危及经济的长远发展。低碳、绿色的发展是国家新的发展理念，技术进步会带来新的产业变革，加强技术创新可引领经济向更加绿色低碳方向发展，确保经济发展之路持续，经济发展动力由之前的外生动力转变为内生动力。

从外贸发展状况看，陕西省 2010 年的进出口贸易额约为 120.81 亿元。即使受到疫情的冲击影响，2021 年的贸易额仍然达到 4757.75 亿元，同比增长了 25.9%。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说明陕西的开放程度扩大，贸易额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增长。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政策后，西安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建立了“一带一路”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统筹推进港口的发展，实现港城、港贸与港产的有机融合，创新了发展模式，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质量逐渐提升。其他的城市同西安相比，外贸发展显著倒退，进出口额断崖式下跌，如商洛市 2021 年的进出口贸易额为 20.69 亿元，铜川市的进出口贸易额为 10.06 亿元，安康市也仅有 11.59 亿元，三个城市的外贸发展与西安相比，差距显著。究其原因，这些地区位于西部地区，外贸发展条件落后于西安市，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其的进出口商品附加值低，可参与外贸的主体也相对较少，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这些地区要精准定位，结合自身条件发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形成新的开放格局，全面推进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2.3 产业结构

按照国民经济分类标准，参照《陕西省统计年鉴》划分的六大类行业为：农林渔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以及其他服务业。2000 年至今，陕西省的经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业经济主导陕西省经济发展。2020 到 2022 年间，陕西省农林渔牧业占比下降，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2009 年，占比不足 10%，2020 年占比 14.3%，到 2022 年时占比降至 8.27%。陕西省工业出现“U”走势，发展为倒“U”型。2012 年工业经济占比最高升至 46%，此后继续快速下降，工业经济呈现波动走势，但占比维持在 40%以上。此外，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产业占比增加平稳，有小幅波动，2000 年到 2022 年间基本持平，维持在 6%左右。建筑行业占比呈现上升走势，但升幅较小，2000 年到 2022 年期间，由最低的 8.5%上升至 8.83%。批发零售业与住宿餐饮业持续走

低，但降幅较小，2000年为9.7%，2022年下降至3.95%。

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可反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促进生产要素更好的配置，进而达到资源使用效率最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往往能代表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比重越大，表示该地区的现代化水平越高，经济结构相对更合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资源要素在全球流动，陕西省紧跟中央深化改革的步伐，优化了营商环境。陕西省通过淘汰传统落后的产业，积极发展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经济结构更合理，现代化水平提高。

根据陕西省各地统计调查数据可以看出，陕西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2022年第三产业的比值约为43.52%，表明陕西省充分依靠自身优势，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从具体数据看，陕西省产业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级：位于第一层级的有西安市、铜川市，总体保持在0.5以上，西安在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与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迅猛，政府为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铜川市积极发展国家战略产业，重点体现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业，不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位于第二层级的有渭南、杨凌示范区、汉中、商洛、安康和咸阳，均在0.3至0.5之间，所处水平相差偏小。位于第三层级的有榆林、延安和宝鸡等地，均在0.2至0.3之间，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能源、化工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陕西省各地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情况，如图3.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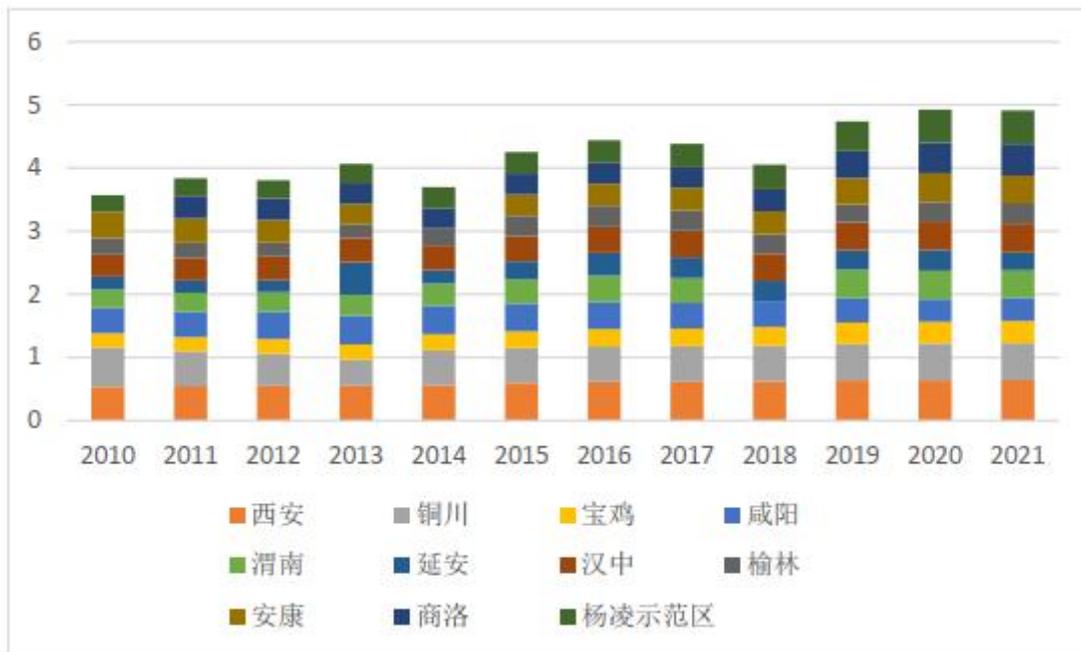


图 3.6 陕西省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3.3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3.3.1 保险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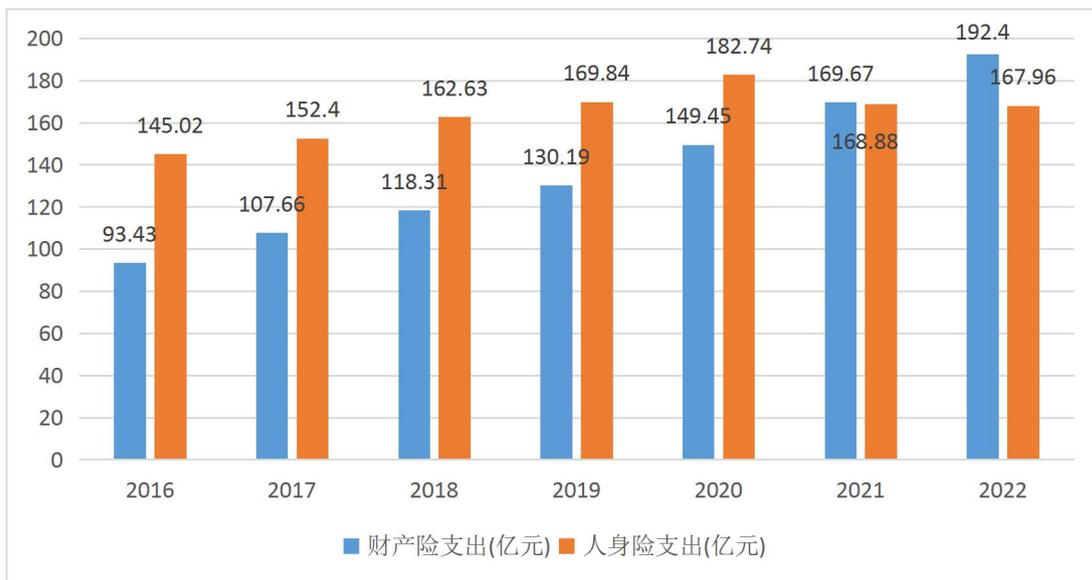


图 3.7 陕西省各保险公司赔款支出分项目情况统计

基于赔款支出数据，全省截止到 2022 年底共产生 360.36 亿元的保险赔款支出。从趋势而言，自 2016 年起，全省各保险分支机构的赔付支出与同期对应的

保费收入相比增速较缓慢，平均每年同比增长约 7.84%。结构上看，其中财产保险赔付支出近几年增速加快，至 2022 年已超出人身保险赔付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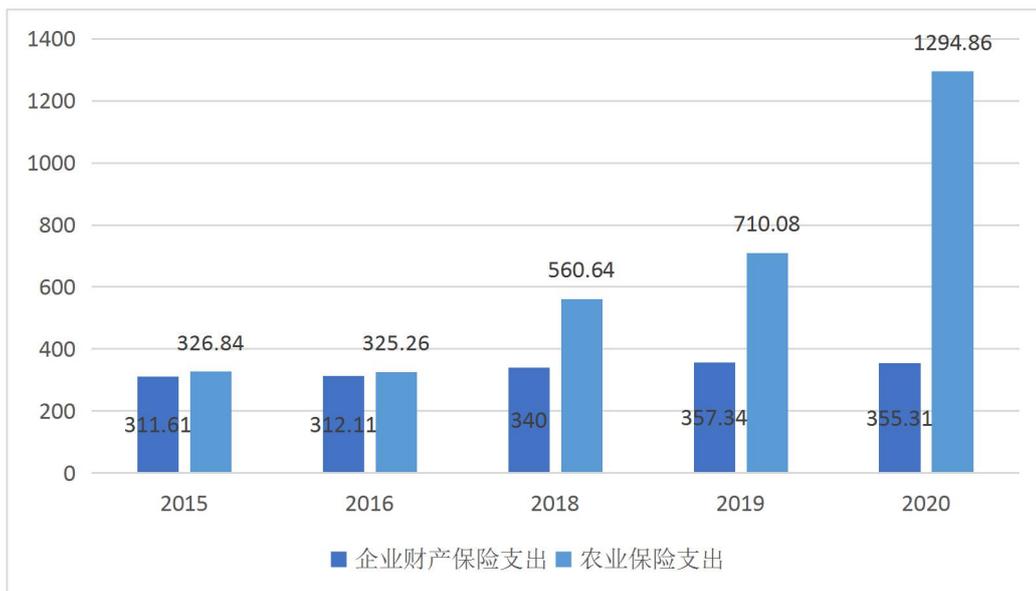


图 3.8 陕西省各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支出分项目情况统计

基于保险机构对于实体经济的保险业务视角，截止到 2020 年，全省各财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在该年度内实现企业财产保险业务收入总计为 10.68 亿元，实现农业保险收入 17.96 亿元。从变化趋势看，自 2016 年起，全省各财产保险分支机构的企业财产保险业务收入变化相对平稳，每年平均以 8% 的同比增速增长，而农业保险业务收入则增速较快，2018 年后收入超过企业财产保险，每年平均以 31.9% 的同比增速增长，较 2016 年增加 11.5 亿元。从赔款支出角度看，全省 2020 年全年分别产生 3.55 亿元的企业财产保险支出和 12.94 亿元的农业保险支出，农业保险支出是其主要支出项目。从变化趋势看，企业财产保险支出较 2016 年增加 4320 万元，每年平均同比增速为 3.4%，企业财产保险支出增长缓慢，与 2016 年相比，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而农业保险支出的增速加快，年平均同比增长 45.22%，较 2016 年增加 9.69 亿元，截止至 2020 年底农业保险支出数额已超出企业财产保险的三倍。

3.3.2 社会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情况

社会融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社会融资包含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部份，直接融资是指债券、股票等在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直接获取资

金的模式，间接融资主要是以信贷为主的获取资金模式。陕西省金融融资手段主要为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模式相对滞后。

2022年，陕西省银行业落实稳经济发展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围绕金融增长持续发力，加大服务实体经济，为陕西省经济持续恢复贡献有力支称。2022年末，陕西省金融机构资产总额7.8万亿元，同比增长12.2%；负债总额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4%。截至2022年末，陕西省本外币贷款余额4.9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9万亿元，同比增长10.4%。2022年，新增贷款3659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3192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69.7%。2022年，陕西省运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加大对民营、小微和三农利益的贷款投放。2022年末，全省小微贷款余额3726亿元，同比增长27.8%；金融支持制造业货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1%，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1.7个百分点；全省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5093亿元，同比增长37.6%，较上年末提升3.5个百分点。2022年，陕西省表外融资额增加150亿元，同比多增1810亿元。其中，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115亿元，同比多增33亿元；委托贷款增加42亿元，同年多增215亿元；信托贷款减少7亿元，同比少减1262亿元。2022年12月，陕西省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0.52%、0.39%。

2022年，陕西省证券业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上市公司数量稳步增加，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2年末，陕西省共有法人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各3家，法人基金公司1家，证券分公司63家，证券营业部240家。2022年，陕西省累计代理证券交易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26.1%。截至2022年末，陕西省内上市公司75家，新增上市10家。截至2022年末，全省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54亿元，同比增长17.2%；实现归母净利润662亿元，同比增长22.8%。陕西省2022年证券行业详情见表3.1。

表 3.1 陕西省 2022 年证券行业基本情况

项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3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1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2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75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383

当年发行 H 股筹资（亿元）	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3057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721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72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陕西分行、陕西证监局、陕西发改委

3.3.3 优化金融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情况

2022 年，陕西省持续深入推进支付体系建设，不断优化银行账户服务，落实落细支付手续费降费政策，持续提升支付服务便民水平，深入开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依法规范支付市场秩序，畅通疫情等特殊时期支付清算渠道，陕西支付服务质效不断提升，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基础金融服务支撑。

第一，成立陕西省征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司旗下的“秦信融”征信平台推动，先后建立征信平台和融资服务平台 8 个，累计实名注册用户超 10 万，入住金融机构 400 余家，撮合交易 320 亿元。陕西省开展“促融资 纾企困”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三年倍增专项行动（2020-2022 年），2022 年促成融资额较 2019 年增长 2.4 倍。征信系统覆盖面逐步扩大，“现场+线上”查询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2022 年末，建成征信查询网点 331 个，15 家金融机构开通信用报告线上查询功能。践行“征信为民”理念，“征信修复”乱象专项治理“百日行动”收效明显，持续推进征信宣传教育，有效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第二，积极利用科技创新再贷款激发小微企业创新活力，当前拥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与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总计 1.2 万家。为支持科技企业信贷，建立了信贷支持监测系统，强化企业与银行对接工作。在陕西省引入 21 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开设分支，先后推出数十种科技创新再贷款信贷产品。2022 年，科技创新再贷款产品面向千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累计百亿元。

第三，以陕西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为支点，优化科创金融支持体系。建立秦创原“四贷促进”金融服务工作站暨陕西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基地，落地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全面优化秦创原科技企业融资环境。推动金融机构在秦创原设立科技支行、特色区域行等专营机构近 150 家，推出“秦创贷”、“秦创原知识产权贷”、“秦创原小微企业孵化贷”等金融产品，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2022年，陕西省积极践行金融为民理念，推进辖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陕西省以“金教+投教共建、银行+证券联动”为特色，建立省级金融教育示范基地10家、市级13家。同时，陕西省不断完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陕西12363呼叫中心全年共受理投诉4962件，办结率96.9%，受理咨询2.2万件，指导陕西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成立金融类纠纷预防化解研究实践基地。陕西省创新开展“促进金融健康专项行动”，构建“产品+教育+行为+研究”四维模式，打造金融健康评估体系。

3.4 本章小结

本章内容是在前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从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金融业发展情况、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三个方面展开介绍。从信贷总量和金融业内部发展、融资结构、金融支持措施三个方面分析陕西省金融发展现状。从实体经济产值、质量、产业结构三个方面探究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现状。从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情况、社会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情况、优化金融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三个方面探究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的情况。

4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测度

根据上文对于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本章拟通过 DEA-Malmquist 指数测度方法，构建一个包含金融中介投入、金融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产值的多投入，单产出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测度模型，以期全面了解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4.1 DEA-Malmquist 效率测度模型原理

首先，定义产出投入向量形式。该模型存在 N 个决策单元，时间长度为 T 期，使用 M 种投入要素，最终生产出 S 种产成品。则投入要素和产成品的向量形式为：

$$x_j^t = (x_{1j}^t, x_{2j}^t, x_{3j}^t, x_{4j}^t, \dots, x_{mj}^t)^T \quad (4-1)$$

$$y_j^t = (y_{1j}^t, y_{2j}^t, y_{3j}^t, y_{4j}^t, \dots, y_{sj}^t)^T \quad (4-2)$$

其中， x 代表投入要素， y 代表产成品。

其次，构建最佳生产前沿面。根据 DEA 多投入，多产出的运算逻辑，将最佳生产前沿面构建成如下形式：

$$L^t(y^t) = \left[(x_1^t, x_2^t, x_3^t, \dots, x_m^t) : y_{ns}^t \leq \sum_{n=1}^N w_n^t y_{ns}^t ; x_{nm}^t \geq \sum_{n=1}^N w_n^t x_{nm}^t ; w_n^t \geq 0 \right] \quad (4-3)$$

其中， w 为第 n 个地区的观测值的权重。

再次，构建距离函数：

$$D_c(x, y) \quad (4-4)$$

$$D_v(x, y) \quad (4-5)$$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即基于 (4-4) 式的函数形式， (x^t, y^t)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可以表示为 $D_c^t(x^t, y^t)$ ， $t+1$ 期的距离函数可以表示为 $D_c^{t+1}(x^t, y^t)$ ；同样， (x^{t+1}, y^{t+1})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可以表示为 $D_c^t(x^{t+1}, y^{t+1})$ ，在 $t+1$ 期的距离函数可以表示为 $D_c^{t+1}(x^{t+1}, y^{t+1})$ 。在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即基于 (4-5) 式的函数形

式, (x^t, y^t)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形式为 $D_v^t(x^t, y^t)$, $t+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_v^{t+1}(x^t, y^t)$; 同理, (x^{t+1}, y^{t+1})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为 $D_v^t(x^{t+1}, y^{t+1})$, 在 $t+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_v^{t+1}(x^{t+1}, y^{t+1})$ 。

再次, 初步测算效率指数。在 t 期的技术条件下, 从 t 期到 $t+1$ 期的技术效率变化值和在 $t+1$ 期技术条件下, 从 t 期到 $t+1$ 期的技术效率变化值分别为以下两式, 即式 (4-6) 和式 (4-7)。

$$M^t = \frac{D^t(x^{t+1}, y^{t+1})}{D^t(x^t, y^t)} \quad (4-6)$$

$$M^{t+1} = \frac{D^{t+1}(x^{t+1}, y^{t+1})}{D^{t+1}(x^t, y^t)} \quad (4-7)$$

最后, 测算 DEA Malmquist 指数。即首先测算从 t 期到 $t+1$ 期的 TFPCH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量), 再将 TFPCH 进行三分解, 分别测算 TECHCH (技术变动)、PECH (纯技术效率变动)、SECH (规模效率变动)。其表达式如下。

$$M(x^t, y^t; x^{t+1}, y^{t+1}) = \sqrt{M^t M^{t+1}} = \sqrt{\frac{D^t(x^{t+1}, y^{t+1})}{D^t(x^t, y^t)} \cdot \frac{D^{t+1}(x^{t+1}, y^{t+1})}{D^{t+1}(x^t, y^t)}} \quad (4-8)$$

$$M(x^t, y^t; x^{t+1}, y^{t+1}) = \frac{D_v^t(x^t, y^t)}{D_v^{t+1}(x^{t+1}, y^{t+1})} \cdot \left[\frac{D_v^{t+1}(x^{t+1}, y^{t+1})}{D_c^{t+1}(x^{t+1}, y^{t+1})} \middle/ \frac{D_v^t(x^t, y^t)}{D_c^t(x^t, y^t)} \right] \cdot \sqrt{\frac{D_v^{t+1}(x^{t+1}, y^{t+1})}{D_v^t(x^{t+1}, y^{t+1})} \cdot \frac{D_v^{t+1}(x^t, y^t)}{D_v^t(x^t, y^t)}}} \quad (4-9)$$

$$PECH = \frac{D_v^t(x^t, y^t)}{D_v^{t+1}(x^{t+1}, y^{t+1})} \quad (4-10)$$

$$SECH = \frac{D_v^{t+1}(x^{t+1}, y^{t+1})}{D_c^{t+1}(x^{t+1}, y^{t+1})} \middle/ \frac{D_v^t(x^t, y^t)}{D_c^t(x^t, y^t)} \quad (4-11)$$

$$TECHCH = \sqrt{\frac{D_v^{t+1}(x^{t+1}, y^{t+1})}{D_v^t(x^{t+1}, y^{t+1})} \cdot \frac{D_v^{t+1}(x^t, y^t)}{D_v^t(x^t, y^t)}}} \quad (4-12)$$

其中, (4-8) 式表示的是 DEA Malmquist 指数的计算方法。(4-9) 式为效率指数的三分解形式。(4-10)、(4-11)、(4-12) 式分别指 PECH、SECH、TECHCH 的表达式。

4.2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在此次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模型构建时, 本文首先将构建一个多投入单产出的指数模型, 完成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测算。其中, 投入要素包括金融资金投入和金融中介投入; 而产出要素为实体经济增加值。此外, 本文将陕西省 10 个市设为 10 个不同的决策单元, 时间从 2010 年开始, 到 2021 年

结束，并以年为间隔进行测算。数据均来自于 Wind 数据库、SCMAR 数据库、锐思统计以及《陕西省统计年鉴》。测算软件使用 deap2.1。各投入与产出指标选取和描述性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 4.1 效率测算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及说明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单位
投入指标	金融资金投入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金额+上市公司市值+保费收入	万元
	金融中介投入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万人
		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产出指标	实体经济增加值	地区生产总值-房地产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	万元

表 4.2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测度各指标描述性统计

	实体经济产值	从业人员	资金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万元	万人	万元	万元
均值	16833545.00	2.06	30351713.00	15893.12
中位数	12368350.00	1.17	9319097.00	5125.20
最大值	86642600.00	17.00	434000000.00	247789.00
最小值	1650900.00	0.33	1166096.00	31.21
标准差	15982371.00	2.94	69419282.00	38568.80
偏度	2.34	3.21	3.82	5.05
峰度	9.07	13.26	18.15	29.39
Jarque-Bera 统计量	293.79	731.60	1439.09	3992.85
JB 统计量的伴随概率	0.00	0.00	0.00	0.00
变量数值之和	2020000000.00	247.47	3640000000.00	1907175.00
总离差平方和	30400000000000000.00	1031.05	57300000000000000.00	177000000000.00
样本空间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资料来源：陕西省省会和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4.3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指数分析

4.3.1 陕西省总体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指数分析

表 4.3 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指数计算结果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时间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2010-2011	1.015	0.995	0.938	1.082	1.010
2011-2012	1.161	0.852	1.110	1.046	0.989
2012-2013	0.965	1.115	1.045	0.924	1.077
2013-2014	1.034	0.840	1.011	1.023	0.869

2014-2015	1.026	0.793	0.976	1.052	0.813
2015-2016	1.001	0.956	1.020	0.981	0.957
2016-2017	1.047	0.960	0.991	1.056	1.005
2017-2018	1.062	1.198	1.023	1.039	1.273
2018-2019	0.933	1.257	0.949	0.984	1.172
2019-2020	0.912	0.953	0.933	0.978	0.869
2020-2021	1.087	1.228	1.049	1.036	1.335

根据披露的图表信息可知：2010年至2021年间，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表现出升降的波动情形。2010至2013年间，该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水平变化基本平稳，维持在1的水平线上。而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该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值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15年跌入近十年以来的最低点，效率指数接近0.8的水平线。自2016年开始，到2021年结束，该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水平有所改善，效率指数在2021年达到1.335的最高点，同时期间内波动显著。根据上述分析，在2016年以前，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不佳是这一时期内的主要特征，自2016年起，该省金融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迎来新的阶段，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虽然有改善，但是金融体系依然不能稳定发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

从该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分解图像来看，该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基本同步于技术进步指数变动，但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变化方向差异明显。此外，近十年间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化幅度也相对较小。由此可知，该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发展变化主要由金融领域及其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变迁推动实现的。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不足和相应金融体系管理能力欠缺所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制约效率水平的平稳健康发展。

4.3.2 省会和地级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指数分析

表 4.4 陕西省省会和各地级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指数计算结果

	2010-2 011	2011-2 012	2012-2 013	2013-2 014	2014-2 015	2015-2 016	2016-2 017	2017-2 018	2018-2 019	2019-2 020	2020-2 021
安康	1.019	1.273	1.088	1.005	0.557	0.939	1.021	1.245	0.885	0.860	1.129
宝鸡	0.470	0.942	1.018	0.846	0.893	1.033	1.006	1.012	1.446	0.716	0.856
汉中	1.150	1.182	1.761	0.661	0.389	0.921	1.060	2.484	1.833	1.217	2.126

商洛	1.043	0.996	1.068	1.189	0.817	0.952	0.907	1.051	0.893	0.843	1.009
铜川	1.350	0.946	0.936	0.703	0.759	0.949	1.229	1.113	1.049	0.878	1.095
渭南	1.026	0.960	2.093	0.475	0.815	0.888	1.016	1.184	0.961	0.881	0.959
西安	1.315	0.866	0.965	0.996	1.381	1.019	1.090	2.027	1.386	0.971	1.739
咸阳	1.095	1.030	0.937	0.901	1.085	0.859	0.779	1.197	1.525	0.668	2.264
延安	1.009	0.813	1.150	0.873	0.787	1.217	0.908	0.990	0.890	0.890	1.701
榆林	0.955	0.964	0.493	1.399	1.098	0.845	1.102	1.074	1.236	0.870	1.228

基于上述图表信息可知,从各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在十年间的数值变化看,其中安康、汉中、西安、咸阳、榆林的效率水平基本能够维持在1水平线以上,说明这些城市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服务程度较好。

分区域来看,陕南地区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的表现最佳,关中地区次之,陕北地区最差。从关中地区来看,西安和咸阳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较好,同时与其他关中地区的城市差异性显著。可见西安和咸阳由于西咸新区等一体化建设项目的稳步推进,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推动作用增加,但很难再次带动周边城市金融支持效率水平的提升。陕南地区除汉中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表现突出之外,其他城市效率水平表现普通。对于陕北地区的延安和榆林两座城市,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功能在近几年虽得到明显改善,但整体水平不佳。

4.4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测度方法,构建一个包含金融中介投入、金融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产值的多投入单产出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测度模型。经过模型分析陕西全省与各地级市的效率测度,结果证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虽有改善,但总体水平不足,且波动幅度较大。此外,各地级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水平差距明显,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地理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发展特征。因此,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水平不足。

5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实证分析

本章内容根据前文对于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和效率测度结果,准备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与各金融支持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模型,从而进一步探讨本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与各金融支持要素之间的因果关联性,为提升本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寻找出路。

5.1 变量选择

本次实证模型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综合效率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选取金融发展水平、中长期贷款规模、金融体系结构和政府政策干预这四个指标,控制变量选取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指标。下面分析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依据和计算方法。

表 5.1 实证模型指标选取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英文表述	单位	公式
被解释变量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指数	TFP	%	根据上文的测算得到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	FDI	%	金融业增加值/GDP
	中长期贷款规模	MLLS	%	银行中长期贷款/GDP
	金融体系结构	FSS	%	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额
	政府干预	DGPI	%	财政支出/GDP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IS	%	第一二产业增加值/GDP
	经济发展水平	EDI	元	人均 GDP

5.1.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综合效率指数由上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测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

5.1.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金融发展水平、中长期贷款规模、金融体系结构、政府干预。具体指标选取依据和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金融发展水平。根据前文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描述，仅注重金融体系规模的量性增长并不能有效提高金融业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服务功效，同时基于米建国、李建伟（2002）的观点，实现经济最优增长，需以金融适度发展为条件。因此，本文选取代表金融体系规模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通过金融业增加值与 GDP 之比计算得出。

第二，企业中长期贷款指标。根据前文对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梳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企业信贷是企业获取融资的主要来源，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根据潘敏、缪海斌（2010）的观点，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银行信贷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根据陕西省目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选取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系统所提供的企业中长期贷款，作为该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解释变量。中长期贷款规模通过银行中长期贷款与 GDP 之比计算得出。

第三，金融体系结构指标。基于前文对于金融功能理论的解释，应根据金融系统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来选取合适的金融组织结构，同时根据林毅夫、章奇等（2003）的观点，只有金融体系结构、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及其所对应的需求相匹配，才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针对目前陕西省独特的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和发展特点，现有的金融组织结构是否稳定发挥，需要针对本省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做进一步论证。因此选择金融体系结构这一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金融体系结构由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保费收入、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总额三者之比计算得出。

第三，关于政府干预。基于王文甫、明娟（2014）的观点，地方政府干预过多会导致经济产能过剩问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选取政府政策干预这一解释变量指标。政府政策干预经财政支出与 GDP 之比计算得出。

5.1.3 控制变量

本文为确保实证分析模型变量选取的完整性，同时排除其他因素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故选取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控制变量。产业结构经计算 GDP 中第一、二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得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 表示。

5.2 模型设定

根据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构建如下标准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_{it} = \alpha_i + \sum_{k=1}^6 \beta_k x_{kit} + \mu_{it} \quad (5-1)$$

其中 y 表示被解释变量, x 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μ 为随机干扰项, α 为截距项, β 为各解释变量对应的系数, k 为解释变量个数, i 为地区数量, t 为时间期数。

由于本次回归模型所采取的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均以面板数据构成样本,因此可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划分为三种模型估计形式,即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效应模型。其中,固定效应模型认为,不同时间的模型截距项是不同的,而各变量的系数是固定不变的。同时,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时间和个体角度区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认为,各变量的系数为随机变量,符合正态分布。若一部分变量的系数是符合随机变量分布的,而另一部分变量的系数是固定不变的,则判定为混合效应模型。具体选择哪种模型,需要依据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的结果来确定。

$$y_{it} = \sum_{k=1}^6 \beta_k x_{kit} + \alpha_i + \varepsilon_{it} \quad (5-2)$$

$$y_{it} = \sum_{k=1}^6 \beta_k x_{kit} + \alph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3)$$

$$y_{it} = \sum_{k=1}^6 \beta_k x_{kit} + \alph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4)$$

5.3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各类指标数值均通过查阅陕西省统计年鉴、省会和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 Wind 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再经进一步计算和整理获取。

5.4 回归结果

表 5.2 三种模型下的回归结果统计

指标名称	英文表述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	------	--------	--------	--------

截距项	a	-4.0416** (0.0246)	-1.3094 (0.2858)	0.0147 (0.8899)
金融发展水平	FDI	-0.1403 (0.4031)	-0.1403 (0.5969)	0.0147 (0.8899)
政府政策干预程度	DGPI	-0.1173 (0.8191)	-0.1173 (0.4864)	-0.0755 (0.518)
企业中长期贷款规模	MLLS	0.2557** (0.0521)	0.2557 (0.5816)	0.0728 (0.4071)
金融体系结构	FSS	-0.2086*** (0.0043)	-0.2086 (0.2011)	-0.0333 (0.3709)
经济发展水平	EDI	0.3316** (0.0529)	0.3316 (0.4528)	-0.0120 (0.787)
产业结构	IS	0.4519 (0.519)	0.4519 (0.2268)	-0.2032 (0.4084)
	F-statistic	1.901723** (0.0324)	1.327675 (0.251579)	
	R-squared	0.232815	0.071788	0.069935
	Adjusted R-squared	0.110392	0.017718	0.025220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通过对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算,得出陕西省及下辖地级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综合效率与各金融支持要素之间的回归结果。根据反映回归结果的数据表,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可知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下,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前系数均为-0.1403,而在混合效应模型下,金融发展水平前系数为 0.0147。同时在三种模型下,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的伴随概率均相对较大。因此,无法判定金融发展水平对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综合效率有显著影响。其次,就政府干预程度而言,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下,其系数均为-0.1173,而在混合效应模型下,政府干预程度前系数为-0.0755。同时,政府政策干预程度系数在三种模型下的伴随概率均较大。由此可知,政府干预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呈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再次,中长期贷款规模前系数在基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数值为 0.2557,而其系数基于混合效应模型的数值为 0.0728。同时,中长期贷款规模前系数在固定效应模型下的伴随概率约等于 0.05,而在其他两种模型下的伴随概率远超过 0.1 的临界值。可见中长期贷款规模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另外两种模型下,中长期贷款规模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并无显著正向影响。金融体系结构前系数在基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数值均为-0.2086,而在基于混合效应模型的数值均为-0.0333。同时,金融体系结构前系数在固定效应模型下的伴随概率为 0.0043,小于 0.01

的临界值,而在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模型下的伴随概率均大于 0.1 的临界值水平。因此,金融体系结构对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下该影响是显著的,在其他两种模型下,该影响并不显著。

表 5.3 F 检验结果

F 检验结果	
混合效应模型残差平方和	11.95259
固定效应模型残差平方和	9.862155
F 统计量	2.213860178
分子自由度和分母自由度	(9, 94)
F 分布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1.9810084

表 5.4 Hausman 检验结果

Hausman 检验结果			
Test Summary	Chi-Sq. Statistic	Chi-Sq. d.f.	Prob.
Cross-section random	12.567898	6	0.0504

通过对该模型进行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能够得出哪种模型更优。根据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的结果不难看出,F 统计量经计算结果为 2.2139,而 F 分布在分子自由度为 9 和分母自由度 94 情况下的临界值为 1.981。因此,F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水平,进而说明应当拒绝采用混合效应模型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而根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发现卡方统计量为 12.5679,而卡方统计量所对应的伴随概率为 0.0504。因此,应当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因此,根据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的结果,说明此次回归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变量的数值回归结果及其意义应以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为准。

5.5 稳健性检验

表 5.5 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统计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截距项	a	-4.429117** (0.0174)	-1.077507 (0.3782)	-1.077507 (0.401)
金融发展水平	FDI	-0.164724 (0.3221)	-0.008995 (0.948)	-0.008995 (0.9504)
政府政策干预程度	DGPI1	0.025125 (0.3855)	0.004974 (0.85)	0.004974 (0.857)
企业中长期贷款规模	MLLS1	0.238347* (0.0969)	0.012381 (0.8891)	0.012381 (0.8942)

金融体系结构	FSS1	-0.194026*** (0.0079)	-0.036007 (0.2562)	-0.036007 (0.2792)
经济发展水平	EDI	0.380788*** (0.0066)	0.080151 (0.2542)	0.080151 (0.2771)
产业结构	IS	0.254246 (0.6513)	-0.376304 (0.2129)	-0.376304 (0.2351)
	F-statistic	1.858751** (0.037555)	1.280141 (0.272957)	
	R-squared	0.228758	0.069396	0.062971
	Adjusted R-squared	0.105687	0.015186	0.017921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为进一步增强实证回归模型的稳健性，选择对解释变量指标进行替换的方法再次对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本文选择对企业中长期贷款规模、政府干预程度、金融体系结构三个指标，分别使用非金融机构及机关团体贷款与 GDP 之比、政府金融支出与 GDP 之比、直接融资规模与间接融资规模之比的计算方法替换原有的指标计算方法。此外，将企业中长期贷款规模、政府政策干预程度、金融体系结构三个指标的英文表述重新命名为 MLLS1、DGPI1、FSS1。根据下表模型回归结果，发现此次模型估计结果和显著性特征与之前的模型估计结果和显著性特征相一致，同时也均拒绝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的原假设，说明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稳健。

5.6 实证结论分析

5.6.1 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关系不显著

基于回归结果，金融发展水平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通过西安和各地级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比例数值进行对照，近十年西安的比例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各地级市的比例水平相对较低，与西安市相差 6%到 8%。从变化情况看，陕西省各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增加，且增幅较快。因此，可知该省的金融规模偏小，但发展速度很快，从而引起金融脱实向虚问题。金融脱实向虚使其难以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因此可知，近十年来，金融规模量性增长无法显著地提升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

5.6.2 企业中长期信贷可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

基于回归结果，企业中长期贷款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从陕西省近十年的中长期贷款规模情况看，可知中长期贷款规模在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区域的比值分布差异偏大，西安与其他各地级市的数值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变化情况看，陕西省各市的中长期贷款规模基本是在波动中取得规模的增加。该省几年来响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政策号召，创新信贷资金运作模式取得初步成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重振民营实体经济。因此，金融机构的中长期信贷可有效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5.6.3 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呈负向关系

基于回归结果，金融体系结构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过观察近十年金融体系结构的发展变化，可知陕西省整体的金融体系结构数值不足 50%，各市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关中地区金融体系结构数值较高，而陕北和陕南地区的金融体系结构的数值较低。从时间变化而言，陕西省金融体系结构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该省通过金融市场获取融资的企业大多以能源、国防、半导体、新材料做为主营业务的大型地方国企和央企，而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由于结构分散、规模较小、特点不突出，所以广泛存在高昂的参与成本和非对称信息问题，较少通过金融市场参与融资。要进一步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确保完善的金融体系结构持续不断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动能，仍需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地方产业竞争力的中小微企业。

5.7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前文对于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和效率测度结果，构建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与各金融支持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模型，以进一步探讨本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与各金融支持要素之间的因果关联性，为提升本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探寻策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中长期信贷和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综合效率之间分别存在正向和负向的关系，从而为提升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政策建议方向

提供依据。

6 结论和建议

6.1 结论

首先，本文从金融业发展现状、实体经济发展现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现状三个方面分析，不仅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实体经济产出展开深入论述，同时探究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渠道现状，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测度的指标选取和后续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其次，通过进一步采取 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分析方法，构建由金融资金投入、金融中介投入、实体经济增加值组成的投入产出模型，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进行测度。经过测算证实，陕西省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功能近几年虽有改善，但作用发挥程度稳定性差，区域差距显著，由此说明陕西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不佳。

最后，通过前文对陕西省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对于本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水平的测度结果，构建由企业中长期贷款、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组成核心解释变量体系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分析模型，探寻本省金融支持要素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政策建议方向提供解释。经研究发现，银行系统所提供的企业信贷业务可有效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以股票发行为主的证券市场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不显著，此外盲目推进金融规模量性增长，会加剧经济金融化程度，进而产生金融体系脱实向虚问题。

6.2 建议

6.2.1 健全地方法人金融中介和融资担保机构协同服务体系

研究证实，企业中长期信贷可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因此，不难说明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是促进本省实体经济发展的 channels。而本省的金融机构系统种类丰富度不足，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明显不足。创新型金

融机构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因缺乏正确的规范指引，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出明显不足的趋势。因此在间接融资方面，陕西省应注重构建以信息技术引领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组成的中介服务体系，同时加强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与规范，防止金融脱实向虚。

第一，做大做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为确保该策略实施，政府有关部门可设立中小企业金融需求调查统计厅，切实做到对中小企业经营情况的统计和金融服务需求的调查，及时与三家大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使其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同时建立中小企业信贷工作评分机制，对评分较高的地方法人银行给予大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交流合作的机会，推动形成中小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从而进一步推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共同发展。

第二，发展创新型金融公司。为确保这一策略实施：首先，陕西省政府牵头组织设立创新型金融公司发展基金会，制定创新型金融公司的发展规划方案，主张参与创新型金融公司的改革重组和新金融公司的设立。其次，基金会与大型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可先行设立一批中小型创新型金融公司开展创新业务试点，同时针对本省目前已无业务运作能力的金融公司，逐步进行兼并重组的方式，令其逐步退出市场。再次，基金会可与相应的金融监管部门展开合作，考虑在业务逐步推进过程中，逐渐完善金融创新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最后随着业务运营系统的成熟，逐步引入具有竞争性的民营资本参与投资，让金融创新业务发展步入新台阶。

第三，要加快完善融资担保体系，促成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合作。为充分贯彻落实这一战略，陕西省应从加快融资担保资源的整合重组、探索实施政府引领+担保护航+银行合作的担保联盟运作模式、深入推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的金融科技服务业态方面着手，具体措施如下：

(1) 加快融资担保资源的整合重组，进行顶层设计。各地金融管理部门需根据本省融资担保体系区域差异特点以及不同的服务对象，制定差异化的融资担保体系设计方案。具体包括：在省级层面培育大型再担保公司，以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在市级层面，发展中型担保公司，以对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事件的处理；在社会层面，针对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所面临风险的分散、多样、频繁的特点，相应培育小型担保公司。

(2) 探索实施政府引领+担保护航+银行合作的担保联盟运作模式。首先,政府通过制定融资担保体系构建顶层设计方案,积极主动参与投资构建融资担保公司的设立与规模扩展。其次,政府通过构建成熟的法律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牵头建立自律组织,促使行业规范化运行,从而使得担保机构在政府的引领作用下,发挥担保机构的自主创新优势,开发新业务新模式。再次,政府通过设立奖励机制引导融资担保公司向特定行业提供服务,同时构筑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业务洽谈平台,及时发布担保业务需求,同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合作需求,以保证银行系统在具体的业务运作模式中实现与融资担保体系的对接。

(3) 深入推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的金融科技服务业态。为进一步激发金融机构创新活力,陕西省政府应致力于推行新型金融业态发展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数字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结合更加紧密,本省应当把握好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探索金融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形成传统金融模式与创新金融模式的融合,促进两者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为深入推进该战略,本省金融管理和政策研究部门应分析目前金融机构对信息科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使用程度及应用深度。其次,制定符合本区域数字信息技术应用特点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建立金融科技调查特派专员制度,重点聚焦大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对于金融科技的应用情况,支持引导大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就具体业务层面深入探索信息科技与信贷相结合的新型业务模式。最后,通过绩效评估对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金融科技业务进展情况进行打分评比,及时公布相应信息,形成各层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相互竞争新局面,共同提升金融机构创新型金融服务模式水平。

6.2.2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培育具有陕西特色衍生品交易市场

研究证实,一个地区的金融结构要符合该地区的发展阶段,符合其发展时期的实际经济要求,反之则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率。由于陕西省的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之间呈负向关系。因此,陕西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既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金融体系结构,又要积极培育具有陕西特色的衍生品交易市场,确保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积极作用。

首先,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直接融资方面,我们既要看到所

取得的成就,又要看到问题,更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主动功能。陕西省要想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支撑经济转型、提升陕西省的整体竞争力,均离不开直接融资的大力发展,并持续增加其在直接融资中的比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的功能。陕西省要强化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筹资和理财功能,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建设相结合,把长期的资金投入到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让各种中长期的投资队伍更强大,提升上市公司的发展质量。

其次,培育发展具有陕西特色的衍生品交易市场。衍生产品交易具有套期保值的作用,可用于规避企业经营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因此衍生品市场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支持作用。本省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形势较惨淡,但其具有能源、战略资源、农产品、经济作物等底层资产储备优势。所以对本省实体经济发展而言,发展衍生品交易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为确保战略实施,可从特色产品开发和产品价格体系构建两方面权衡。

在特色产品开发方面。首先,本省证监会可与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开展合作交流,制定本省以特色能源类、战略资源类、农产品作物类为基础资产的衍生产品发展行动计划。其次,构建产业龙头、证监会、大型金融机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开发当地特色化衍生产品,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先行参与,待条件成熟后,鼓励企业分批次跟进。与此同时,联席会议及时做好衍生产品行情监测和风险监测,及时根据市场变化制定风险管理方案,防止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在产品价格体系构建方面。政府与各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合作,成立衍生产品价格评估体系委员会,根据不同种类的基础资产的市场供需状况,针对其所对应的衍生品设立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引导参与主体根据定价方针参与市场的交易。同时要针对不同要素产品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对其定期评估与修正。

6.2.3 推进覆盖产业集群全产业链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

研究证实,陕西省产业发展禀赋特征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因此,陕西省金融管理部门应从改善区域性金融服务体系空间布局和探索创新型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两个方面入手,建设覆盖产业集群全产业链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首先,改善区域性金融服务体系空间布局。为有效承接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建设,促使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陕西省应加快聚集金融资源,深入打造区域性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区。首先,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发展阶段特征,战略规划片区,陕西省可制定相应的区域金融集聚发展战略。其次,打造由政府牵头建设具有一定规模且功能丰富的金融项目投融资平台,该平台包括现有金融机构的规模拓展、新金融机构的设立、原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等项目要素。再次,投融资平台通过项目投融资信息发布,由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引领,广泛进行招投标,共同参与区域性金融集聚区建设。

陕西省三大区域金融服务体系布局的具体策略如下:

第一,加快关中科技金融功能区建设。首先在莲湖区、碑林区、新城区三大区域的西安主城区范围内,依托该地新城科技产业园、碑林科技产业园、红光物流园等产业园区所带来的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应用、物流运输,规划建设以金融科技、区块链技术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服务中心,鼓励银行类金融机构在此地设立创新型金融科技研发中心,服务于银行信贷业务。同时鼓励创新型金融企业在此地落户,探索以服务于产品物流运输行业的创新型金融模式。其次,在未央区和浐灞生态区范围内,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和西安综合保税区的对外贸易优势,加快发展外向型金融中心,推动金融机构开发人民币跨境结算,外汇信贷等业务分支部门,同时引领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促进金融机构走出去。在长安区、雁塔区、高陵区等区域范围内,依托航空航天发动机、国防军工、机械零部件、新材料等行业优势,建立大型金融机构集聚区,鼓励大型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信托公司、私募股权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在此设立执行部门,探索开发联合信贷业务和风投基金项目。

第二,推动陕北能源金融功能区建设。首先,在榆林和延安两市,基于榆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延安能源化工专业孵化器等产业园区带来的能源化工产业集群优势,设立能源金融功能区,考虑采取政府引领+风投机构参与+企业跟进的方式,创设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基金产品,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此外,由于两市不断推动金延安文化旅游产业园和榆林文商旅融合众创产业园等园区建设,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因此考虑建设文化金融区域中心,该功能区主要依靠银行机构在此地设立金融与文旅对接融合的金融服务部门,该区域内企业可

以依靠文化创意、知识产权、文化产品要素等软信息获取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第三，推动陕南绿色金融功能区建设。近年来，汉中市加快推进铺镇工业园区、汉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洋县电商扶贫创业孵化园等园区建设，陕南地区中小企业居多，结合其生态绿色农业、电子商务、轻工业产品加工制造的产业发展特色，应考虑建设区域性中小银行信贷服务中心。为达成该目标，陕西省可由政府设立激励政策，大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批次落户，中小型信用合作社和村镇银行继续跟进的模式推进，从而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金融服务中心。该区域中心重点探索支小贷款、支农贷款、加工制造业贷款等信贷业务实现形式。

其次，探索创新型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为更好地促进不同区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陕西省应加快推进创新型供应链金融产业布局，进一步推进延链、补链、链长制工作机制，打造覆盖产业集群内各行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体系的全产业金融供应链。为深入贯彻实施这一金融发展战略，陕西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各级金融管理部门根据区域内产业集群的优势特色企业进行甄别和筛选，锚定优势特色产业的核心企业。其次，通过理解供应链运行逻辑并深入调查，确定核心企业供应链线路，形成产业供应链图谱。再次，金融管理部门向金融机构发布相应产业图谱信息，确保金融机构及时接收。最后，通过一系列激励政策扶持金融机构开发供应链金融业务，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通过金融全产业链服务模式的优化和深入，陕西省可形成金融服务能力新增长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可引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落实国家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 [1] Chatterjee K U,Bazzana F.Do corporate credit spreads predict the real economy?[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24,91 272-286.
- [2] Ionescu V R,Fortea C,Zlati L M,et al.Studying Differing Impacts of Various Monetary Aggregates on the Real Econom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2023,11(4):88-92.
- [3] Joeri L,Asier M,Rutger L.A systematic narrative review of pathways into,desistance from,and risk factors of financial-economic cyber-enabled crime[J].Computer Law&Security Review: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and Practice,2024,52
- [4] Few C L,Siva N,Vikas A.Recap of the 2022 annual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November 4–5,2022[J].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23,61(2):755-762.
- [5] Jean-Pierre A,Zied F,P.G K.The 3rd Financial Economics Meeting(FEM-2022)Conference:New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capital flows,and exchange rate frameworks after COVID-19[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23,136.
- [6] Ria K,Rully T,Rifqy T T.The Economics of Banking and Finance in Africa:Developments in Africa's Financial Systems[J].Quantitative Finance,2023,23(6):913-915.
- [7] Shahzad H,Raazia G,Sabeeh U,et al.Empirical nexus betwee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carbon emissions:Evidence from heterogeneous financial economies and regions[J].Heliyon,2023,9(3):e13164-e13164.
- [8] Nazia L,Zahir M F.Examin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load capacity factor(LCF):System GMM analysis for Asian economies[J].Frontiers in Energy Research,2023.
- [9] Melissa F V,Conrad H,Marta S.Contextualist model evaluation:models in financial economics and index funds[J].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 Science,2023,13(1):6-6.
- [10] M.A L,W.J G,A.H C,et al.Economy,financial,and regulatory metho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lectrical energy storage in a power network[J].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2023,58.
- [11] 曹啸,吴军.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和特征分析[J]. 财贸经济, 2002.
- [12] 陈丰华.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
- [13] 陈丽婷.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结构调整与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甘肃省数据的实证检验[J]. 青海金融, 2023.
- [14] 陈享光,高泽铭. 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观[J]. 社会科学文摘, 2023.
- [15] 陈享光,黄泽清. 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兼论“脱实向虚”问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
- [16] 戴伟,张雪芳. 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7.
- [17] 刁月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 商, 2015.
- [18] 董竹,周悦. 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J]. 经济学家, 2019.
- [19] 冯彦明,杨天昊.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与中国金融的发展方向[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23.
- [20] 郭贝贝,吕诚伦.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内在逻辑、匹配机制与改革措施[J]. 湖南社会科学, 2022.
- [21] 过旭东.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
- [22] 赫国胜,燕佳妮. 金融发展、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0.
- [23] 季益烽. 金融结构的变迁与最优金融结构[D]. 南开大学, 2014
- [24] 贾洪祖.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J]. 全国流通经济, 2023.

- [25] 李青原,陈世来,陈昊.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22.
- [26] 李志锋. 基于金融资源视角的房地产金融理论框架研究[D]. 山西财经大学, 2015
- [27] 刘立军,刘义臣. 科技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以京津冀为例[J]. 经济问题, 2022.
- [28] 刘清娟.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
- [29] 陆凤芝,王群勇. 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 [30] 陆岷峰,欧阳文杰. 产业金融与实体经济: 政策环境、模式比较与实践路径[J]. 理论月刊, 2023.
- [31] 马靖昊.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再升级[J]. 新理财, 2023.
- [32] 米建国,李建伟.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思考与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
- [33] 潘爱玲,凌润泽,李彬. 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基于资本结构调整的微观证据[J]. 经济管理, 2021.
- [34] 潘海峰,程文,张定胜.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测度及其空间效应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2.
- [35] 潘敏,缪海斌. 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压力[J]. 经济评论, 2010.
- [36] 石璋铭.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 [37] 宋立义.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演进与政策实践[J]. 经济研究参考, 2022.
- [38] 孙红燕,管莉莉,张先锋. 基于 FWTW 现金流量表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测算研究——兼论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 [39] 谭中明,刘倩,李洁,等. 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2.
- [40] 唐雪松,周晓苏,马如静. 政府干预、GDP 增长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J]. 金融研究, 2010.
- [41] 完颜素娟. 金融业增加值的国内外比较及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研究[J]. 西南金

- 融, 2022.
- [42] 汪发元, 郑军.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动态空间模型分析[J]. 经济经纬, 2019.
- [43] 王爱萍, 胡海峰.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23.
- [44] 王立国, 鞠蕾.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26 个行业样本[J]. 改革, 2012.
- [45] 王文甫, 明娟, 岳超云. 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 管理世界, 2014.
- [46] 王永钦, 高鑫, 袁志刚, 等. 金融发展、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一个文献综述[J]. 金融研究, 2016.
- [47] 翁仕友. “中国式”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干预企业退出[J]. 四川水泥, 2013.
- [48] 吴少将. 金融开放、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 2020.
- [49] 吴晓辉. 社会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J]. 中国商论, 2020.
- [50] 谢德金. 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D]. 南开大学, 2014
- [51] 徐玲玲, 何文彬. 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23.
- [52] 徐伟呈, 范爱军. 数字金融、内驱机制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 [53] 杨继梅, 孙继巧. 金融发展、资本配置效率与实体经济——基于不同维度金融发展视角[J]. 投资研究, 2021.
- [54] 杨世伟. 习近平关于金融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探析[J]. 经济学家, 2020.
- [55] 游士兵, 杨芳.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绿色发展视角[J]. 金融论坛, 2019.
- [56] 张成思, 张步昙. 再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视角[J]. 经济学动态, 2015.
- [57] 张林.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J].

金融经济研究, 2016.

[58] 张硕楠. 基于金融分权视角的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2019

[59] 张亦春, 王国强.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非均衡关系研究——基于双门槛回归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 2015.

[60] 周悦, 董竹.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

[61] 周悦.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研究[D]. 吉林大学, 2020

[62] 朱伟骅.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程度研究[D]. 复旦大学, 2008

[63] 朱喜安, 李文静.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夏普利值分解模型[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

后 记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想向我的导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不仅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高度的指导和建议，还在生活中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我的导师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对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指导。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学术研究得到了显著的进展，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此外，我的导师还为我提供了许多参加学术会议和拓展人脉的机会，使我能够在学术界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在此，我想再次向我的导师表示感谢。

我还想向我的同学、家人和朋友们表示感谢。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们一直给予我支持和鼓励，使我能够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我的同学们为我提供了许多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机会，使我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此外，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也一直为我提供了关爱和支持，使我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信心和勇气。在此，我想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想向所有为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表示感谢。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许多人为了我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论文撰写还是在生活中，他们都给予了我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想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总之，我衷心感谢所有帮助和支持我完成硕士学位的人。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职业生涯中，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和专业素养，为社会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